

全球南方专题

迈向新的“大协议”： 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安全治理转型

沈 陈

内容提要：关于全球南方崛起与否、何以崛起，一直以来是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争议的根源在于对全球南方崛起的既有研究多强调经济、外交以及理念层面，而国际关系中的“崛起”概念则聚焦于安全层面。换言之，判断全球南方崛起的关键是国际安全治理的等级结构是否发生改变。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经常被排除在安全“大协议”之外。尽管在冷战时期全球南方曾试图联合自强，但未能改变雅尔塔会议之后的美苏争霸局面。冷战结束后，“三个世界”的表述过渡为“南北关系”，非传统安全逐步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重点，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机制的话语权、组织性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全球南方拒绝追随西方国家，这不仅是冷战时期不结盟理念的回归，还得益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南方机制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南方崛起并不意味着取代西方，而是致力于构建主体平等、议题广泛的新型安全治理模式，这也为推动公平正义、兼顾和平发展的安全“大协议”奠定基础。

关键词：全球南方 国际安全治理 “大协议”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作者简介：沈陈，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24) 06 - 0027 - 18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编号：2023YZD029）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编号：DF2023ZD0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初稿曾在202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青年论坛和第十四届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上宣读。

“全球南方”一词产生于冷战时期^①，当时该词与“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等概念基本一致。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一些学者认为，在“南方”之前添加“全球”一词，意在强调该概念的体系属性而非地理属性，从而将北方与南方、富国与穷国、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概念置于全球视野之下，强调上述二元概念之间的等级关系。^②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划分，全球南方涉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和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③从个体上看，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水平滞后，存在贫困程度高、人口增长率高、教育机会有限、卫生系统不足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面临独立自主与战略依附的张力。因其组织模式松散、协调能力不足，全球南方未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足够的影响力。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全球南方的国际角色再一次引发广泛关注。尽管西方国家努力将乌克兰危机塑造成“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但未能引起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共鸣。^④在2022年3月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52个全球南方国家不支持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一个月后，82个南方国家拒绝支持西方中止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提案。2024年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布尔根施托克举行，派出代表的巴西、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全球南方大国选择不签署峰会文件。全球南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感到困惑，表明这场冲突暴露出的国际体系的真正分裂不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是全球北方（即西方国家）与

① Carl Oglesby, “Vietnamism Has Failed. The Revolution Can Only Be Mauled, Not Defeated”, in *Commonweal*, 1969, p. 90.

② Jonathan Rigg, “The Global South”, in *Voi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ncepts of the Global South*, Cologne: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of University of Cologne, Issue 1, 2015;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9, 2021, pp. 1923-1944.

③ “UNCTADstat – Classification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 [2024-11-02]

④ Elizabeth Sidiropoulos, “How do Global South Politics of Non-alignment and Solidarity Explain South Africa’s Position on Ukraine?” August 2,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do-global-south-politics-of-non-alignment-and-solidarity-explain-south-africas-position-on-ukraine/>. [2024-11-02]

全球南方之间的分歧。^①对此，无论从西方中心角度视为“失去的全球南方”^②，还是从南方主体角度称为“全球南方崛起”，都表明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治理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需要对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给予有效解释。

一 关于全球南方崛起的解释与争议

关于全球南方崛起与否、何以崛起，既有研究长期存在争议。主张全球南方崛起的研究多从经济、外交以及理念等层面出发，解释其在实力对比、外交自主以及合作理念等方面的重大进展。但也有学者质疑这些进展是否能够作为崛起的支撑，因为从安全角度来看，全球南方无论在自身综合实力还是在国际影响力上都不能称为“一极”。下面对已有研究关于全球南方崛起的解释与争议进行梳理，进而提出分析全球南方崛起的可行路径。

（一）实力对比视角

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南方崛起是国际力量格局深度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上，全球南方快速发展并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位靠近，由西方主导的垂直现代世界体系正逐渐让位于一个多中心的国际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新的区域和跨国“南南”联系正在形成。^③在安全上，全球南方不仅是面临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威胁的“高风险地区”，而且逐步取代西方国家成为治理上述威胁的中坚力量。当前，中国、印度、非洲联盟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组织是国际维和部队的主要派遣方，客观上增加了南方群体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议价能力。在政治上，一些全球南方大国将实现“地区强国梦”与追求“全球南方领袖”结合起来，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印

^① Jorge Heine and Thiago Rodrigues, “Brazil Is Ukraine’s Best Bet for Peace”, May 2,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5/02/brazil-russia-ukraine-war-lula-diplomacy-active-nonalignment/>; Jorge Heine, “Non-Alignment Is Back in the Global South, Albeit in a Different Incarnation”, February 27, 2023. <https://www.bu.edu/gdp/2023/02/27/non-alignment-is-back-in-the-global-south-albeit-in-a-different-incarnation/>. [2024-11-02]

^② Mathew Burrows and Aude Darnal, “Red Cell: Is the West Losing the Global South?” June 6, 2024. <https://councilpacificaffairs.org/2024/06/06/red-cell-is-the-west-losing-the-global-south/>. [2024-11-03]

^③ Philip S. Golub, “From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o the G20: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Restructuring World Capitalism from Within”,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4, No. 6, 2013, p. 1012.

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① 这些国家组成金砖国家、中等强国联合体（MIKTA）等新型国际机制，在制度性力量、贸易能力和官方发展援助三个维度上提升自身影响力，对国际秩序发展演变产生重大影响。^②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南方的经济增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等级化的南北关系。如李小云、徐进指出，全球南方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是在与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和相互嵌入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如果说摆脱殖民主义、建设民族国家曾经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政治议程，那么发展问题则依然是全球南方国家当前共同的挑战。^③ 在《勃兰特报告》发表40年后^④，尼古拉斯·利斯基基于全球南方国家相对收入排名和对国际秩序的不满程度两个指标，发现勃兰特线“基本上完好无损”，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南方国家的经济多样性有所增加而已，但是这种多样性“不会削弱勃兰特线所描绘的南北差距”^⑤。阿尔弗雷德·J. 洛佩斯更是宣称，全球化所承诺的财富并没有实现，它作为一个全球主流叙事已经失败；“全球南方”这一身份概念恰恰表明“世界上处于底层的国家和民众相互承认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边缘的共同处境”^⑥。

（二）外交自主视角

关注全球南方崛起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全球南方的外交自主性上升。罗宾·尼布莱特提出，美国和欧洲虚伪的双重标准已经损害了自身的全球信誉和软实力，新不结盟国家开始在世界的两极之间形成三角关系。^⑦ 黄超认为，当前关于全球南方的讨论聚焦于其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自主，既包括短期内

^① Cliff Kupchan, “6 Swing States will Decide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June 6,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6/06/geopolitics-global-south-middle-powers-swing-states-india-brazil-turkey-indonesia-saudi-arabia-south-africa/>. [2024-11-03]

^② Andrew F. Copper, “‘Rising’ States and Global Reach: Measuring ‘Globality’ among BRICS/MINKTA Countries”, in *Global Summitry*, Vol. 4, No. 1, 2018, pp. 64-80.

^③ 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46页。

^④ 《勃兰特报告》是由维利·勃兰特主持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报告中的“勃兰特线”是对南北分界线的视觉描述。参见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London: Pan, 1980.

^⑤ Nicholas Lees, “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 The More North-South Relation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1, 2021, pp. 85-106.

^⑥ Alfred J. López, “Introduction: The (Post) Global South”, in *The Global South*, Vol. 1, No. 1, 2007, pp. 1-11.

^⑦ “Living with a Divided World”, July 15,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vents/all/members-event/living-divided-world.7r>. [2024-11-05]

不盲目跟随西方国家，也包括长期内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① 布鲁金斯研究会的报告指出，美国强调的“自由民主”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这些国家不愿选边站队，反而利用大国彼此争斗而获得影响力。^② 豪尔赫·海涅等学者基于拉美外交经验提出“积极不结盟”政策，即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中美贸易竞争中抵制大国压力，并指出这一政策在亚洲、非洲也得到广泛体现。^③

也有观点认为全球南方外交自主只是实用主义策略，与其理解为战略自主，不如视为利益最大化的体现。伊斯特凡·塔罗西等认为，全球南方国家不愿加入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联盟”，是为了保障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从而在稳定双重等级秩序的过程中做出接触、对冲等战略选择。^④ 赵可金认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在乌克兰危机中站队，是因为它们往往与俄罗斯有着重要的贸易或军事关系，或者只是对西方有着历史上的不信任。全球南方构成了大国竞争的新中间地带，其不选边站队的战略对冲态度给大国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⑤ 王明进认为，在理解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不应将全球南方国家的一致行动或主动作为理解为寻求对现存国际秩序做出颠覆性改变。^⑥ 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与不同大国都有牢固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联系。例如，东盟国家历来都声称支持“不结盟”，但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修辞上^⑦，或者采取了“相对的”不结盟。至

① 黄超：《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载《世界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第3-15页。

② Madiha Afzal, Bruce Riedel, and Natan Sach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New Non-aligned’ Countries”, February 2023.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3/02/FP_2023_0213_china_regional_strategy.pdf. [2024-11-05]

③ Carlos Fortin, Jorge Heine, and Carlos Ominami, *Lat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Active Non-alignment Option*, London: Anthem Press, 2023.

④ Istvan Tarosy, “Need for Non-alignment in Our Global Worl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Today and Tomorro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Vol. 11, No. 40-41, 2006, pp. 157-163; 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 “Southern Middle Powers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Options for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76, No. 3, 2021, pp. 384-403.

⑤ 赵可金：《百年变局中的“全球南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12页。

⑥ 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0-59页。

⑦ Adekeye Adebajo, “When Two Elephants Fight: How The Global South Uses Non-alignment to Avoid Great Power Rivalries”, February 14, 202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en-two-elephants-fight-how-the-global-south-uses-non-alignment-to-avoid-great-power-rivalries-199418>. [2024-11-05]

于什么程度的结盟是相对的、可以接受的，不结盟运动也没有给出统一标准。^①

（三）合作理念视角

合作理念视角将全球南方崛起理解为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南南合作理念的升级发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先后经历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三个历史时期。^② 尽管全球南方发生了从“体系反抗者”到“体系融入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变化，但二者具有历史身份的连续性，进而塑造了不结盟运动等全球南方合作的当代韧性。萨朗·希多尔等认为全球南方国家间在历史记忆、改革诉求、共同发展愿景等方面存在深刻联结，把南南合作的当前发展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团结相联系，认为这是不结盟运动的再现。^③ 埃里卡·霍根等认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引起中低收入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共鸣，是因为它表达了对国际政治中持久等级制度的排斥甚至拒绝。鉴于此，与其用“全球南方”来指代某种僵化的阵营或国家集团，不如将其理解为构建更加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④ 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理念、身份和传统，全球南方得以不断强化其内部合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转型成为统一、有力的国际机制。^⑤

然而，也有学者对全球南方合作传统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一些人甚至呼吁逐步淘汰“全球南方”这一表述。例如，阿兰·比蒂撰文称，这个标签“傲慢、不准确、自相矛盾”，而且“非常无益”。^⑥ 约瑟夫·奈指出，77国集

① John Ciorciari, “As Ukraine War Deepens Great-power Divisions, A Revitalized Non-aligned Movement Could Emerge”, April 22,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s-ukraine-war-deepens-great-power-divisions-a-revitalized-non-aligned-movement-could-emerge-181136>. [2024-11-05]

②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载《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1期，第83—113页。

③ Sarang Shidore, “The Return of the Global South”, in *Foreign Affairs*, August 31,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return-global-south-critique-western-power>. [2024-11-08]

④ Erica Hogan and Stewart Patrick, “A Closer Look at the Global South”, May 20, 2024. <https://carnegi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5/global-south-colonialism-imperialism?lang=en>. [2024-11-08]

⑤ S. I. Keethaponcalan, “Reshaping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Challenges and Vision”, in *Bandung: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 Vol. 3, No. 4, 2016, p. 13.

⑥ Alan Beattie, “The ‘Global South’ Is a Pernicious Term That Needs to Be Retired”, September 14,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7f2e0026-56be-4f3d-857c-2ae3a297daab>. [2024-11-08]

团由 135 个国家组成，成员国之间存在太多差异，导致其无法发挥有意义的作用。^① 格林·威廉姆斯等认为，尽管全球南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议程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环境条件、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全球南方内部仍存在巨大的差异。^② 杨慧认为“全球南方”的含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北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其崛起不是南方国家之间协调和联合运动的产物，而是个别国家自身利益扩展的结果。^③ 李嘉伟主张，全球南方的限度在于多数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法实现完全的“自助”，发展上受依附性的限制，安全上受全球联盟体系的约束。^④ 埃里克·奥兰德认为，不结盟运动究竟是通往某种形式的更大合作，还是一个原子化的国际平台，仍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⑤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的分歧引发广泛关注，总体表现为国家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国际政治上的多边主义、意识形态上对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抵制和地缘政治上对西方的集体觉醒。^⑥ 对此，既有研究分别从历史传统、实力对比、实用主义等视角予以解释，但都未能完整解释全球南方崛起的深层动力及其与既有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实力对比视角捕捉到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物质力量以及话语权、影响力的上升，但无法解释为何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小国家也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类似的独立立场。外交自主视角捕捉到全球南方维护自身独立自主、发展权利的普遍诉求，但没有充分反映其在价值理念方面的演变。合作理念视角捕捉到全球南方在理念、政策上与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但未能置于国际体系转型的视野下解释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与冷战后新型南南合作的内在逻辑联系。

^① Joseph S. Nye, “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November 3, 2023.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 [2024-11-08]

^② Glyn Williams, Paula Meth, and Katie Willis, *Geographies of Developing Areas: The Global South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4.

^③ 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第1-23页。

^④ 李嘉伟：《“全球南方”概念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分析》，载《国际论坛》，2024年第3期，第119-137页。

^⑤ Eric Olander, “China, Latin America, and the Rise of a New Non-Aligned Movement”, February 16, 2023. <https://chinaglobalsouth.com/podcasts/china-latin-america-and-the-rise-of-a-new-non-aligned-movement/>. [2024-11-08]

^⑥ 王明国：《从边缘性反抗到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载《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5期，第15-30页。

无论是关于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追求，还是当前全球南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进展，都只是全球南方崛起问题凸显的一个侧面。^①事实上，近年来地缘冲突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才是全球南方角色受到关注的关键，而既有研究对地缘政治特别是地缘安全的关注有限。不同于传统国际安全理论局限于大国博弈、权力转移等议题，对全球南方崛起的研究必须打破“修昔底德陷阱”争论的藩篱^②，既要在国际安全治理层面对全球南方从“反抗者”到“融入者”再到“参与者”的身份变化进行完整连续的回顾；也要重新评估新兴力量崛起和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变化，以反映当今世界以及全球南方自身的复杂性。鉴于此，本文从国际安全治理变迁和转型的角度，探索全球南方角色演进的基本路径。

二 国际安全等级化治理下的全球南方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崛起”的讨论聚焦于安全层面，即一国或某一集团能否在国际安全治理中居于优势地位，能否被视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极”。尽管既有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全球南方角色演变的动因，但较少触及安全层面，未能探讨全球南方对国际安全等级化治理模式的改变，而这正是关于全球南方崛起与否、何以崛起争论产生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宏观视角把握全球南方角色的变迁，进而完整解释全球南方崛起的深层动力及其与传统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

（一）国际安全治理的等级结构

国际安全治理等级结构是一种大国垄断国际安全事务的治理结构，大国通过相互之间的“大协议”，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并规定了一段时期内的国际秩序。国际安全治理等级结构根植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理性的国家都必须将本国的安全至于首要位置，除非一个国家充分解决了其面临的政治、军事威胁，否则其他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③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追求本国权力或实力最大化。一国及其主导的军事集团实力越强，其在

^① Carlos Fortin, Jorge Heine, and Carlos Ominami, *Lat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Active Non - Alignment Option*, London: Anthem Press, 2024.

^② 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载《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89页。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9.

国际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越大，而中小国家在国际安全治理中则被排斥在外。正因如此，国际安全治理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大国协调、集团政治，甚至被简化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治理起源于维也纳会议所达成的“大协议”。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列强为重建国际秩序在维也纳召开会议，会议确立了英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并通过维持大国间的协调与均势保障欧洲的和平稳定，即所谓“欧洲协调”。^①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国家通过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达成安全协议和条约。维也纳会议的进步之处在于用谈判和对话取代武力冲突，维护了长达百年的欧洲和平。然而，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大国垄断国际安全治理的原则，其他国家则“被迫遵守游戏规则，因为它们太弱，在谈判时不被认真对待”^②。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国际安全治理等级结构得到了后世继承，此后的凡尔赛会议、雅尔塔会议继续由大国所垄断，并分别规定了一战和二战后的国际安全秩序。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治理延续了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大协议”，其他国家要么被排斥在治理过程之外，要么成为“被治理的对象”。

不可否认，等级化国际安全治理下的“大协议”包含着大国协调与合作。但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制约，大国仍会采取军备升级、领土扩张、联盟构建等一系列旨在强化自身安全的措施，从而降低其他大国的安全感并造成安全困境。首先是由防御性措施带来的“体系引发型安全困境”，即在一个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由于缺乏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国家间互信不足，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性措施，但这些措施无意中增加了其他国家的威胁感知，从而引发了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③其次是由进攻性措施带来的“国家引发型安全困境”，即一个国家将其安全建立在另一个国家的不安全之上。这种安全困境通常由于守成国试图通过精心策划的进攻性政策

^① Iver Neumann and Sieglinde Gstöhl, “Introduction: 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 in Christine Ingebritsen, et al.(ed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 5.

^② Anders Wivel, Alyson J. K. Bailes, and Clive Archer, “Setting the Scene: Smal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Clive Archer, et al.(eds.), *Smal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3.

^③ Ken Booth and Nicholas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364.

来威慑其邻国，以达到巩固现状的目的。然而，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区分守成国的真实意图，导致这些国家相应增加防御性措施，从而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①

安全困境导致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成为等级化国际安全治理的优先议程，而贸易、金融、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少受到重视，进而形成安全治理议程上的等级结构。^② 具体来说，传统安全问题基于国家间的安全互动或安全威胁，其普遍存在于具备冗余安全能力的大国之间^③；非传统安全则指向跨国家或国家内部的安全威胁^④，通常产生于安全能力较弱的中小国家。例如在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阵营对抗和意识形态竞争。因此，美苏之间安全治理主要围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削减进行长期谈判，以及在两国主导的北约和华约组织之间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由于这种稳定建立在两个超级大国、两个军事集团对立的基础之上，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美苏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没有减少美苏对全球南方的争夺和代理人战争等局部冲突的爆发，因此整体上恶化而非改善了全球中小国家的安全状况。

（二）全球南方对美苏垄断国际安全治理的回应

国际安全治理的等级结构本质是大国主导的实力政治、集团政治。作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全球南方国家存在经济落后、制度多元、组织松散等特点，无力影响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对抗，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国际安全治理的议程之外。二战后，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再加上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愈发认为有必要加强合作以抵御外来干涉。1955年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举行。与会各国认为，殖民主义正在走向终结，但新独立的全球南方国家仍处于从属地位；全球南方国家确保安全的

^① Jack L. Snyder,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in Robert Jervis, et al.(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3.

^② 国际安全通常采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二分法，二者分别又被称为“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传统安全强调战略规划和硬实力的运用，涉及复杂的谈判、联盟和追求军事能力以确保国家安全，是大国关注的焦点。非传统安全通常以公平、正义和追求共同利益为指导原则，需要合作、建立共识和分配资源以满足国际社会的共同需求，这类安全更多受到中小国家重视。

^③ 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页。

^④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9-146页。

唯一手段是寻求独立自主，对内有权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外避免与美苏中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以免依附于某一阵营或暴露于另一阵营的威胁之下。1961年9月，首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不结盟运动继承了万隆会议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提出通过远离大国争霸来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发展空间。不结盟运动还呼吁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从以统治为基础的旧秩序过渡到以国家间合作为基础的新秩序”^①，改变美苏垄断的国际安全治理结构。

国际安全治理的前提是威胁感知，而全球南方与美苏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威胁感知并不一致。由于大国通常具备更强的经济韧性和安全能力，可以将安全治理的重点聚焦于政权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而无须过多担心金融、环境、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相反，全球南方国家不仅要面对政权巩固、国防建设等传统安全事务，更亟须应对本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威胁。因此，全球南方对国际安全治理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1964年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会上有77个不结盟国家发表了联合宣言，标志着77国集团正式成立。77国集团寻求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生产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与资本主义经济旧秩序实现“脱钩”。1974年，77国集团推动签署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行动纲领，提出主权平等、民族解放、自主发展、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原则，反映了全球南方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同等重视。

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致力于促进全球南方的协调合作，提出了不同于维也纳会议的平等化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然而，由于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成员国众多、来自不同的地区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且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导致其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政策立场和行动方案。此外，部分不结盟运动国家与美国或苏联事实上结成同盟，破坏了全球南方内部团结和“不结盟”的初衷。例如在1979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古巴、越南等国明确支持苏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国倾向于站在美国一边，南

^① Erica Hogan and Stewart Patrick, “A Closer Look at the Global South”, May 20,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5/global-south-colonialism-imperialism?lang=en>. [2024-11-08]

斯拉夫和印度则试图调和组织成员的不同立场。^① 20世纪80年代,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部分成员国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急需的流动性,许多先前主张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全球南方国家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采取“结构调整”等自由化改革。此后,等级化安全治理架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得到了巩固,全球南方争取话语权影响力的努力遭受重大挫折。

三 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安全治理转型的互构关系

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没有克服全球南方的异质性与松散性,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苏主导的国际安全治理格局,但仍然从两方面回应了国际安全治理的等级结构。在传统安全方面,不结盟成为全球南方在超级大国竞争中保护国家主权和扩大外交空间的地缘政治战略;在非传统安全方面,77国集团通过倡导和平发展、平等包容以及拒绝选边站队的理念,表达了全球南方对国际安全治理的不同理解,体现了其对等级化国际安全治理的排斥和拒绝。这些理念不仅激发了历史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动性,而且与国际安全治理未来发展的方向相契合,从而形成了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安全治理转型的互构关系。

(一) 非传统安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重点

冷战后期,国际安全议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武力使用”的研究模式显得过于狭窄^②,无法捕捉全球南方的安全关切。勃兰特报告首先提出使用“非传统的方法”看待安全问题,金融动荡、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正在成为新的安全焦点。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此类安全问题不仅是某个国家面临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全人类利益的整体问题,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还会产

^① John Giorciari, “As Ukraine War Deepens Great-power Divisions, A Revitalized Non-aligned Movement Could Emerge”, April 22, 20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s-ukraine-war-deepens-great-power-divisions-a-revitalized-non-aligned-movement-could-emerge-181136>. [2024-11-08]

^②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13-133页。

生显著的扩散效应。例如，在东亚、拉美等地区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并且随着地区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甚至可能酿成更大的全球性危机。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不能简单地分开对待和处理。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引发的后果，如战争造成的难民问题、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等。其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恐怖组织一旦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最后，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则相关国家可能依靠军事措施等传统安全手段来解决，如中亚、非洲部分国家曾多次因资源紧缺而爆发武装冲突。

（二）全球南方积极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

随着冷战结束、东欧剧变，“三个世界”的表述过渡为“南北关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等术语也面临着批评，因为这些表述暗含将西方发达国家视为理想目标，而把其他国家描绘成需要模仿、学习的群体。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场合开始用更中性的“全球南方”一词来代替“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等表述。此外，全球南方也正在展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未曾有过的综合实力。进入21世纪，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的份额达51.3%，实现了对发达国家GDP总量的超越。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进程还将继续，预计202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GDP总量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1.6倍。^①在贸易、金融、援助等领域，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也出现类似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繁荣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繁荣，西方繁荣与南方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均面临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暴露了西方国家垄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严重缺陷。为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挑战，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治理机制，与西方国家合作推动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传统上，崛起国通常

^①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i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3.

^② Michael Galant, “Who’s Afraid of the Global South?” April 14,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14/global-south-united-nations-new-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 [2024-11-08]

只有在决定性的战争之后才能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主导国家，但新兴经济体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地位提升标志着多元治理新模式在国际社会中出现，这表明非传统安全治理更适合采取和平、协商、平等的方式构建国际秩序。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还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改革和新型合作机制构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一方面，全球南方通过组织议题联盟参与国际组织改革，在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增加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等新型合作机制也是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平台，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开展宏观协调，分享发展经验、技术和资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相比，金砖国家合作在领域、理念、方式、目标、能力等方面都出现很大不同，凸显了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地位提升（见表 1）。

表 1 不结盟运动与金砖国家的对比

	不结盟运动	金砖国家合作
治理重点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价值理念	意识形态对抗	去意识形态
参与方式	消极“脱钩”、不选边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秩序认知	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维护和改革现行国际秩序
治理能力	话语权、影响力微弱	话语权、影响力上升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三）威胁叠加背景下的全球南方角色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叠加。从无意安全角度看，地缘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一旦以经济全球化为“介质”，便会迅速跨越其源起的安全场域，威胁和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存状态，不断越界和外溢。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效应不仅局限于冲突双方或其所在地区，还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能源、粮食、难民等衍生性的叠加危机。从有意安全角度看，某些国家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蓄意将相互依赖“武器化”“政治化”，借助地缘政治冲突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例如，美欧国家在乌克兰危机期间通过减少或切断与俄罗斯的市场联系、资源供应或限制其使用关键基础设施，以达到损害对手的目的。^①

如前所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双方对现实威胁的感受和对安全利益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随着全球南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实力提升，其国际秩序转型中实现自身诉求的愿望更加强烈。^② 在地缘冲突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因自身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亟待解决，对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上的双重标准愈发不满。全球南方国家消极配合或积极抵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在双边关系中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同俄罗斯的交往。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与俄罗斯贸易规模有限，其自主外交往往不能得到直接的经济收益，因此毋宁说是为了表达不同于西方的观念主张。

近年来，地缘冲突延宕加剧、全球经济形势起伏不定，金砖合作机制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正在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2024年金砖国家机制迎来历史性扩员，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5国成为金砖正式成员。另有30多个国家表达了强烈的加入意向，最终有20多个候选国参加金砖国家喀山峰会，并设置“金砖国家伙伴国”这一新的成员类别。扩员后，金砖国家石油产量占全球的43.1%，天然气产量占全球的35.5%；生产了全球42%的小麦、52%的大米和46%的大豆，在土地、人口、经济、能源、军事等指标上的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扩员增强了全球南方的组织程度，提升了自身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2023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就巴以问题举行特别视频峰会，协调立场并采取行动，推动冲突各方开展对话。2024年5月，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已得到超过110个国家的积极回应。金砖国家还在本币结算、危机救助以及国际组织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共识和成果，回应了全球南方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迫切诉求。

^① “安全”分为事故性的“无意安全”（safety）和博弈性的“有意安全”（security）。从全球层面看，无意安全包括传染性疾病预防、货币金融体系稳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从国家层面看，有意安全指涉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保障。参见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页。

^② 黄忠：《全球南方国家的“新不结盟”运动》，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5期，第111-130页。

总体来看，全球南方崛起受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推动（见表2）。从纵向看，全球南方崛起是国际安全治理转型的必然结果。随着以传统安全为主的狭义安全治理逐步向包含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广义安全治理过渡，大国垄断的国际安全治理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而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抵制实力政治、集团政治、意识形态对抗，可以被视为冷战时期不结盟理念的某种回归，显示出全球南方强调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治理中影响力的同步提升。从横向看，全球南方拒绝追随西方国家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同时也得益于2008年以来全球南方在话语权、组织性方面的明显提升。全球南方寻求在国际论坛和区域组织中以更统一的声音发言，显示其正在成为动荡变革世界里的稳定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表2 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角色变化

时段	治理重点	治理结构	全球南方的地位角色
冷战时期	传统安全为主，忽视非传统安全	大国垄断治理进程	全球南方追求自主，主张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冷战结束初期	传统安全式微，非传统安全为主	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南北对话与合作	金砖国家加强内部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	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治理分歧凸显	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机制建设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四 迈向新的国际安全“大协议”？

国际安全治理转型的核心是治理主体变动、治理议题转换以及治理范式变迁。

在主体上，等级化国际安全治理强调阵营对立、争霸战争的权力逻辑，全球南方国家处于追随甚至缺席状态；全球南方的国际安全理念则要求遵循发展优先、公平公正的合作逻辑，全球南方在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获得提升。前者对应集团式、等级化、对抗性的国际安全治理，在集团内部表现为家长式霸权治理，在集团外部表现为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均衡”。后者则属于不结盟、平等性、非对抗的国际安全治理，对内强调求同存异、多

元民主，对外确保相互依赖，坚持平等协商。

在议题上，国际安全治理二分法很大程度上将国家安全等同于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只要一国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和持续生存，那么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实际上并不重要。这种二分法假定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是分开的，对权力和国家利益的追求优先于道德或伦理考虑。^① 由于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同步上升，各国需要参与不同领域的规则制定，并对其背后的大国博弈、利益冲突以及安全考量进行综合考虑。国际社会既要重视“无意安全”的挑战，在自愿、平等、对称、效率的基础上完善各领域规则，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也要提防“有意安全”的威胁，谨防相关大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通过异规博弈建起“小院高墙”，危害他国的安全利益。

在范式上，全球南方国家的理论贡献不需要与现有理论有根本不同，重新解释或修正现有的理论结构、引入新的概念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同样重要。^② 全球南方基于和平发展的道德性群体诉求，提出重构国际安全治理二分法，为打破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力量为重点的国际安全范式奠定基础。全球南方的国际安全治理范式不仅是针对乌克兰危机或巴以冲突，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并将作为一项国际关系原则被更广泛地接受。^③ 2024年的金砖扩员以及“金砖+”峰会都表明，全球南方共同坚持包容平等的治理理念，这种理念并不致力于推翻或替代西方的主导地位，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安全治理的等级结构，推动世界朝着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转变。

当前，世界又一次来到“雅尔塔时刻”，有学者开始探讨达成新的国际安全“大协议”的可能性。^④ 一些西方学者宣称维也纳会议达成的“大协议”带来了19世纪的“百年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赞扬雅尔塔会议达成的

^① David M. Craig, “‘High Politics’ and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3, No. 2, 2010, pp. 453–475.

^② Smith Karen,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from Africa”, in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7, No. 2, 2017, pp. 81–92.

^③ James Jay Carafano, Max Primorac, and Dan Negrea, “The New Non-Aligned Movement”, May 15, 2022. <https://americangeostrategy.com/2022/05/15/the-new-non-aligned-movement/>. [2024-11-09]

^④ 科尔图诺夫、赵华胜：《2035年的世界：向好还是变坏？》，2024年4月25日。https://www.guancha.cn/andelie/2024_04_25_732752_2.shtml. [2024-11-09]

“大协议”帮助国际社会度过了70年的动荡不安。^① 这些历史上的“大协议”是大国垄断议程的结果，尽管维护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但仍遭到大部分国家的质疑和诟病。欧盟外交与安全部门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警告称“我们不再是雅尔塔时代了”，“两个大国的势力范围不属于2022年。在这场对话中，不仅仅是美国和俄罗斯，也不仅仅是两个角色”^②。笔者认为，“大协议”本身的作用和价值毋庸置疑，需要反对的是“大协议”背后的等级化治理结构。特别是在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重要性同步上升的背景下，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必然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鉴于此，新的国际安全“大协议”不应重复守成国与崛起国在爆发冲突后的权力分配，而应基于全球南方主张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及拒绝选边站队的安全理念，推动构建迥异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治理范式。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Aaron Korewa, “Putin’s Goal Is a New Yalta”,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putin-s-goal-is-a-new-yalta/>. [2024-11-09]

② “EU Warns US and Russia against New ‘Yalta’ Deal to Divide Europe”, January 6,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4fec318e-1e53-4f9a-999a-443a432dd6cd>. [2024-11-09]

Abstracts

2 The Global South in a Century of Change

Zhao Kejin, Yuan Feng, Wang Fan, Chen Yue, Zhang Jianping, Tang Yongsheng, Wu Zhicheng, Tang Xiaoyang

Abstract: The Global South, emerging from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century, has begun to yiel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independent new force. In this regard, members of the Global South should further define their own positioning. China, being a natural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is an advocate, builder and contributor to its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co-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can strengthen it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Global South,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being an example for them. The importance of the Global South lies also in that it is a strategic fulcrum for China's competition with the US-led West as well as for the promotion of multi-polarity and globalisation in the world. China and other Southern countries fac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rea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cluding WTO reform, as well as in forging consensus, expanding common interests, advancing common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Global South.

Key words: Global South, China, a Century of Chang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27 Towards a New "Grand Bargain":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Shen Chen

Abstract: Whether and why the global South is rising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source of the controversy is that existing studies of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emphasise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ideological dimensions, while the concept of 'ri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cuses on the security dimension. In other words, the key to assessing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is whethe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has changed. The Global South has long been in a weak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s a result, has often been left out of the

“grand bargain” on security. Although the Global South tried to unite and strengthen itself during the Cold War, it failed to change the US–Soviet hegemonic situation after the Yalta Conference. After the Cold War, “North–South relations” replaced “the Three World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gradually beca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is process, the voice and organisation of Global South mechanisms, such as the BRICS countr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On the issue of the Ukraine crisis, the Global South refused to follow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is not only a return to the concept of non–align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mechanism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does not mean replacing the West. Instead, it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security governance with equal subjects and a wide range of issues. This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grand bargain” on security that promotes fairness and justice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grand bargain”, traditional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45 The Basi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Zhang Yife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lective rise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South, the identity of the Global South, which is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developing or Third World countries, is based on shared political–economic preferences and 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is article, the “Global South” is defined as the groups of states that are inclined towards a multipolar political pattern, a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pattern, and a multi–civilisation patte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dentity found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lies in that solidarity should not be dispersed, autonomy should not be suppressed, development should not be exploited, pluralism should not be erased, and multilateralism should not be blocked. Since the West has long tried to divide and fragment the Global South,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Global South have over focused on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on cooperation, it takes more time to improve reality with ideas. The cohe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identity of the Global South meet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resistance. As the only southern country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with a sense of a common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identity found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aking constructive strategic measures to realise the resonance of its own country’s interests, so as to enhance the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with a multipolar and equal political proposi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with a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proposition, advance mutual learning